

秋山图

肖复兴

年轻时候,特别是没有书架更没有书房的时候,特别渴望坐拥书城的感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虚荣的心理作祟。后来,看到青艺演出田汉的话剧《丽人行》,其中那位丽人和富商刚开始同居时,书架上摆满的都是书;后来,书架上的书,都换上了各色高跟鞋,不觉哑然失笑。也笑自己,对于书的态度,和那女人的心思,难道没有那么一点点相似吗?

台湾作家林文月写过一本书《三月曝书》。风和日丽的三月曝书,以防虫霉,是旧时文人的传统,对于台湾,当然更和那里潮湿有关。三月对于我,却是扔书时节。老来之后,几乎每年到春暖这时候,都要把书房里越堆越多的书,毫不客气地清理出一部分,将那些从来没看过的,或看过之后没有必要再看的书,全部请出,送给需要的朋友,朋友不要的,都卖了废品。我不藏书,只读书,我一直觉得书应该是越读越少才是,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书,就像最后的朋友一样少,而不是越读越多,成为臃肿的附庸。

去年年末开始,全屋修整,更换全部上下管道和玻璃窗,工程不小,一下子,屋里弄得十分凌乱,那些塞满书架、堆满角落的书,更显得拥挤不堪。索性来个大清扫,居然整理出一堆小山似的书,突兀地堆在客厅中央。才发现,这样多的书,并不是你的六宫粉黛,是你不需要的。准备全部清理出屋的时候,书堆得不牢,忽然哗啦啦塌下来一角,一本薄薄的小书,滚落在我的脚下。是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

弯腰拾起来,不禁责怪自己,忙乱之中,怎么把这本书也丢弃了呢?这是一本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很薄,只有171页;封面很素净,浅灰底色,只有一方“二三书屋之印”的小篆红印。如今,很少见到这样薄这样素面朝天的书了。书越来越厚,精装越来越多,封面越来越花哨,还要佩戴腰封,一列名人拦腰吆喝示众。世风变异之中,书和人一样。

这样薄的小书,很适合携带,放在衣袋里,就到天坛去了,准备到那里找个清静的地方重读。

想起1980年买到这本定价5角1分钱小书的时候,我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那时候,书的定价以分计算,要让今天的人觉得实在是太便宜了。要知道那时候人们的工资是多少,我是带薪入学,每月工资只有42元半。记得很清楚,学院食堂里中午卖肘棒,每根5角钱,不是什么时候都敢买一回肘棒吃的。买一本《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少吃了一回肘棒。

学院后面地安门大街路东,有一家新华书店,书是在那里买到的。书店窄小,书却很齐全,这本书当时印了两万八千册,幸运的,是其中一本留在我的手里四十二年,差点儿和它失之交臂。

记得当时在戏剧学院的宿舍里,晚上熄灯之后,黑暗中,和同学争论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川端康成,有人喜欢川端康成,我更喜欢芥川,以当时浅薄的阅读经验,觉得川端康成的小说写得有些磨磨唧唧,不如芥川写得干净紧凑,那样大开大合,内容含量大,留白甚多,要不然,那么短短的《竹林中》和《罗生门》,也不能改编成一部电影。幽幽夜色中的争论,意气风发,煞有介事,也自以为,谁也不服谁,谁也没说服了谁。年轻时买书、读书,其意思和感觉,和现在真是不一样。

书的译者是楼适夷先生,看书的后记,知道是他1976年4月到6月所译。他说:“1976年是怎样的一年,4月又是什么日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天快要亮的时候,夜照例是特别黑暗而寒冷的。”1976年,是“四人帮”被粉碎的年份。4月,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那一年,楼适夷先生71岁,从“五七干校”回家快三年了,头上还戴着“帽子”,身上还背着“包袱”。而在当时,芥川的小说尚在“毒草”之列,楼适夷虽认定是“鲜花”,却也悲观地认为“并不准备将来会有发表出版的日子”。这是这本书翻译的时代背景和私人语境,这本书由此而增加了厚度,超出了芥川小说本身。

楼适夷先生是翻译家,之所以当时选择翻译芥川,是别有动机的。在后记中,他说芥川的小说,鲁迅先生是最早翻译到我国的,1923年就翻译了《罗生门》,后来还想翻译芥川的作品,可惜天不假年,未能如愿。楼适夷先生翻译芥

川,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敬重和承继。在后记中,楼适夷先生又说,译稿“是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张稿纸,装订成册,变成一本书的样子,请二三家人,和二三个不与我划清界限还有来往的友人,充当我的读者。”——这种深蓝色的复写纸,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是很熟悉的,在没有复印机、电脑和微信的时代,我和不少写作者,害怕稿子丢失,都用过这样的复写纸复写稿件——于是,他特意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便是“二三书屋之印”,我们便明白了,封面所印这方印章的含义了。

芥川的小说,如今译本很多,这个译本,有如此多的元素在内,便不属于芥川,也属于楼适夷先生和他所属的那个特殊的时代,便有了另一番价值和意味深长所在。

我是坐在天坛的藤萝架下看这本小书的。初春中午的阳光,温暖宜人。这一天,我主要看其中的《秋山图》一篇。四十多年前读过,竟然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当时只顾看《竹林中》和《罗生门》,还有《地狱变》了,也可以看出当时读书不认真,没有能够领悟其中奥妙的缘故吧。这是一篇写清初大画家王时敏两次寻找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名作《秋山图》的故事。同样一幅《秋山图》,五十年之后,时代与人心的跌宕变化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样貌和感觉,亦真亦假,亦梦亦幻,扑朔迷离,以至让王时敏心中竟掠过“狐仙”的缥缈之感。

芥川的小说中,重写并改写历史故事,占有相当部分。这是他那一代日本

小说家的创作传统。我们这样的传统似乎少了些,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后,曾有冯至、陈翔鹤等老作家写过一些这样的历史小说,之后似乎愈发少见。那些热衷于宫斗或王朝更迭或让古人和历史改头换面以迎合今日的小说,似乎不在此列。《秋山图》重写的是我国古代故事,但不是梦回前朝的旧小说。这篇小说写得干净利索,如同冰冷而嶙峋的骨架凛然;又情节步步紧逼,如同层层剥笋而百味次第逸出。

不知怎么搞的,放下书,忽然觉得这一篇《秋山图》的写作风格,和汪曾祺先生有点儿相似。汪先生也喜欢改写古代故事,比如《聊斋》,就曾乐此不疲地改写过多篇。改写古代画家的故事,汪先生也有过写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金冬心》。而且,汪先生和芥川都是取材于我国明清笔记,并非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另起炉灶的编造。芥川的《秋山图》取材于清初恽寿平的《瓠香馆记》;汪先生的《金冬心》取材于清晚期朱克敏的《雨窗消息录》。他们都有这样的兴趣和积累,这样的学养和笔力。

这么一想,如果汪先生重写画家王时敏寻访画家黄公望的《秋山图》,这同样一段故事,不知会写成什么样。芥川写《秋山图》时29岁,正值青春,让汪先生晚年披挂上阵,老眼昏花看来路,流年暗换往来人之中,肯定,会和芥川不一样,会很有意思。

真的很想让汪先生和芥川PK一下,让我大开眼界一番。不过,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汪先生已经故去二十五年。

一本薄薄的小书,一篇短短的小说,竟然拔出萝卜带出泥,连带起三位作家,心头一时涌出莫名的感觉。想想,三位作家都已经仙逝。楼适夷先生活到96岁,最为高寿;汪曾祺先生活到77岁;而芥川活得年头最短,只有35岁。命运跌宕,人生如梦,如那幅《秋山图》一般,如影如幻而幽深莫测。

合上这本《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日头已经偏移,阳光透过枝条清瘦的藤萝架,在书上洒下斑斑点点的光斑,跳动不已。

回到家,再翻书时,发现书中还夹有一小窄条薄薄的小纸片,上面抄录一段话,字迹潦草,是我写的。照抄如下,也许,别一番意思:

番茄初生生长秘鲁和墨西哥森林中,被当成有毒的果子,叫“狼桃”,没人敢吃。十六世纪中叶,英国一公爵到南美游历,见后把它带回英国,做为稀有的礼品,献给情人伊丽莎白女王。从此,欧洲称之为“爱情的苹果”。十八世纪末,法国一位画家,冒中毒致死危险,亲自尝了两三个,觉得酸甜可口,经他宣传而流传。明入我国,最早见于《群芳谱》一书,名“蕃柿”,供观赏。吃才有六十年左右的历史。

这一段是从哪里抄来的,又怎么夹进芥川这本小说中,我已经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关于番茄这样一段历史,还是挺有趣的。算一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抄录这一段,到今天,我们吃番茄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想当年最早翻译芥川小说的鲁迅先生,到现在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再一算,芥川写《秋山图》是1921年12月,到今年也一百年。真是巧合。

怎么那么巧合呢?不知别人会怎么样,如果让我来重新改写《秋山图》,在结尾处,我要加上这样一段。芥川写《秋山图》;鲁迅翻译芥川;番茄由毒变酸甜可口的历史;一百年之后,这样巧合,在这本书中相遇了。尽管有点儿混搭,也许,有点儿意思呢,多有潜台词和象外之意。

2022年3月20日春分写于北京

《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责任》中提到,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做罗素的学生时,就主张学习数学能提高人的品味:

因为好品味是真诚的品味,因此任何使人诚实思考的事都滋养它。

这个“论证”在我看来无懈可击。至于数学和“诚实思考”的关系,我可以提供一些说明。

1. 1993年6月,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以连续三次的学术演讲报告了他的工作,宣布费马大定理已经解决。然而,在对长达二百页、分为六章的论文的审核中,第三章的审稿人尼克·凯茨发现了一个实质性的漏洞。在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怀尔斯千方百计地修补这个漏洞,几乎技穷而几近绝望;直到1994年9月,绝处逢生,凭借灵感找到了填补漏洞的方法。就这样,怀尔斯终于贡献出一个完美无瑕的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关于这件史实,陈克艰老师的点评十分精彩,所以我把原文抄录在此:怀尔斯论文接受审查、发现漏洞、填补漏洞的过程,十分典型地表现了数学事业上成功和荣誉的性质。假使那个漏洞凯茨没有发现,审查就此通过,而在成功庆典、巨大荣誉之后怀尔斯却自己发现了这个漏洞,那么他的内心会怎么样呢?肯定不会像服用兴奋剂未被发觉因而超群夺冠的运动员那样狂喜,说不定竟是一种空虚感、幻灭感。再假使,怀尔斯最后的灵感不来,他未能填补漏洞,只能依诺诺将来和别人,那又怎么样呢?虽然无遗憾,未作最后冲刺,毕竟他在长期的努力中获得了许多新的、深刻的结果,他仍然是成功的,光荣的。费马问题带出了新数学,所以是个好问题;任何人为研究费马问题而创发了新数学,就是个数学家。总而言之,数学事业的成功和荣誉,是自我界定的,无须数学之外的任何东西来衡量。欢呼啊,歌舞啊,鲜花啊,奖金啊,头像登在杂志封面上啊,声音播在百家讲坛上啊,都无须来做什么,因为这成功和荣誉,属于另一个世界。(陈克艰《书中自有声色:两本可以互补的同名书》)

2. 《回忆维特根斯坦》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兼挚友马尔康姆写的回忆录。书中提到这样一则轶事:在一次家庭接待中,为了对哲学的性质作出某种阐释,维特根斯坦出了一个有趣的谜题。它是这样说的:假设有一根绳子沿赤道紧紧地箍住地球。现在假设将这根绳子接长一码。如果这根绳子仍然绷紧成圆形,那么它会高出地面多少?在场的每个人都不假思索地想,绳子离地面的距离会微小到觉察不出来。但这是错误的:实际的距离将约有六英寸。倘若把这道题当成普通的应用题,列出方程式来求解,而不是“不假思索地想”,那么得出正确的答案并不难(1码=36英寸,36÷π≈2≈6)。维特根斯坦说,这里的错误在于被一种“图象”所迷惑:一码这样的长度相对于地球赤道的长度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这图象本身没错,而是用在这里并不“切题”,只会造成误导。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上出现的某种错误与此类似。

或许,有的人面对这道题,直接就能“看”出来:圆直径的增量只须和圆周长的增量保持比例,和其他因素(比如圆周长的总量)完全无关。这时,他得到的就是正确并且切题的图象。即使一时没“看”出来,也没关系。就这个具体问题而言,老老实实地列方程式求解,有助于我们学习正确地“看”。

维特根斯坦用这道数学题作例子,想要说明的是他自己哲学工作的性质:清除心智上的图象造成的误导。这图象有可能本身有错误,也有可能本身正确但是并不切题——就是被用到不合适的事情上。

3. 在《回忆维特根斯坦》中,马尔康姆记述了这样一件他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发生的不愉快:每当我想到你,我就不禁想起一件特殊的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事情……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给你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你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你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词语时比任何一个……因为怀着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种词语的记者更为谨慎,那么,研究哲学有什么用处?你知道,我懂得要彻底地思考“确定性”“或然性”“知觉”等等是很困难的。但是,要对或者力求对你的生活或别人的生活进行真正诚实的思考,如果可能这样做的话,那就还要困难得多。麻烦在于思考这些事情并不紧张激动,倒往往使人陷入困扰。而既然它使人困扰,它就是最重要的。

在思考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警惕“图象”的误导作用,谨慎使用“危险的”词语,这是“好品味”——也就是“真诚的品味”——的一部分。

提高人的品味 学习数学能

李宏均

有一次我们一起沿河散步时,看到一幅报纸经销人的招贴,宣称德国政府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新近的用炸弹暗杀希特勒的行动。这是1939年秋天的事情。维特根斯坦谈到德国的新闻时说,“假如是真的,那一点也不会使我吃惊。”我反驳说,我不相信英国政府的上层人物会去做这种事情;我的意思是说,英国人比较文明正派,不至于打算去做这种卑鄙的事情;我还补充说,这种行为与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我的议论使维特根斯坦很生气。他认为这个说法极端愚蠢,而且还表明我没有从他正在努力给予我的哲学训练中得到任何东西。

我的理解:“民族性格”作为“图象”,本身是否正确?这个复杂的问题可以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判断具体历史情境中具体人物的具体行为而言,这样一个图象是过于粗糙的,因而是切题的。援引它会造成无穷无尽的误导。

到了1944年11月,也就是五年后,维特根斯坦在给马尔康姆的信中重提这次争论:

每当我想到你,我就不禁想起一件特殊的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事情……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给你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你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你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词语时比任何一个……因为怀着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种词语的记者更为谨慎,那么,研究哲学有什么用处?你知道,我懂得要彻底地思考“确定性”“或然性”“知觉”等等是很困难的。但是,要对或者力求对你的生活或别人的生活进行真正诚实的思考,如果可能这样做的话,那就还要困难得多。麻烦在于思考这些事情并不紧张激动,倒往往使人陷入困扰。而既然它使人困扰,它就是最重要的。

在思考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警惕“图象”的误导作用,谨慎使用“危险的”词语,这是“好品味”——也就是“真诚的品味”——的一部分。

老一辈日本人,对中国的古典都比较熟悉。十几年前,我随团访日,到福冈一站时,福冈市政府设晚宴招待,主宾有一位是国际知名的城市规划专家榑木武老先生。席间,老先生说他参与了北京王府井商业街、北京西站的规划设计。我说:“王府井规划设计是成功的。北京西站,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客流车流拥挤阻隔。当然,也许当年设计时没想到会有今天如此多的流动人口。”老先生马上给我说了个汉语成语:“我是榑木庸材啊!”老先生姓“榑”,是机智地用《庄子》里的典故,通过翻译,我马上回应:“无用才能有大用。”老先生知道我听懂了他的自嘲自赞,高兴地举起酒杯:“干!今晚菜有限;酒,敞开来。”另一件日本政坛的轶事也与中国有密切关系:

共同社东京2010年1月22日电,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22日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被问及成语“朝三暮四”的意思,他解答的却是“朝令夕改”的含义,引来一阵哄笑。

自民党议员茂木敏充批评鸠山政府打算停止执行的2009年度第一次补充预算项目再度列入预算,询问鸠山是否知道“朝三暮四”是什么意思。鸠山自信地答道:“我很清楚。是指事物变化很快,轻易就改变了。”茂木就此指出“那应该是朝令夕改。”前首相麻生太郎曾因为读错汉字而导致支持率下降。鸠山也意外暴露出了成语知识不足这一弱点。执政党内有人认为这不是个好兆头。

鸠山对一个汉语成语理解错了,就能成为新闻,这个新闻反证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有多深厚!议员在众议院的哄笑,也颇值得玩味。

笔会

梅兰竹菊

(木雕)

刘恒甫



家乡的曲沃县,前些年以“中国成语典故之乡”为号召,从汉语成语切入,宣传晋国的历史文化。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曲沃在两千多年前就是现在的名称,地名超稳定。据说,现有成语,有三百余条的故事发生在曲沃,一千五百余条与曲沃有关。四字成语,信而有征,家乡的朋友做了认真细致的工作,我从此知闻,旅游产品是可以这样来宣传推介的。

读过《国语》《左传》和《前四史》的朋友,相信曲沃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如果把目光再集中到春秋战国时的历史地图,“晋国天下莫强焉”,我们的脑海里就会翻腾起两千多年前晋国的光荣和梦想。曲沃县以成语的源头吸引游客,是要弘扬浓缩的中国历史文化——这个创意好!

我一辈子从事文字工作,书架上常存小、中、大三三种成语词典,分别是:商务印书馆第六版《汉语成语小词典》,收成语四千六百条;四川辞书出版社,署名李一华、吕德申编的《汉语成语词典》,收成语一万零一十八条;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成语大词典》,收成语一万八千余条。大、中、小三种词典,是与我常在在一起的工具书。大、中两本,是单位发的;小型的一种,是我在王府井商务印书馆买的。这个小型词典,我有初版、修订版等好几种版本;我并不是好收藏词典,而是和这个小型词典有缘。

我们这一代人,“文革”时失学,没正规地念过几天书,“停课闹革命”后,我跟着妈妈去村里的供销社,在图书文具柜台,央求她给我买一本军绿色封面的《汉语成语小词典》。这本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级语言班同学于一九五八年

集体编写、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小词典,陪伴我度过无学可上的日子,是我最早读的文字书、历史书。那个年代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词典前言说,这本小词典,是十七位同学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编纂的;编纂过程中,得到魏建功、周祖谟先生的指导。词典在九月编定,十月就出版了。在初版本扉页,注明魏、周两位先生审定的。十七位同学在词典序言里有个热情高涨的副标题:“献给您,亲爱的祖国!”次年,出版社分工,这本小词典移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也许沾了方大林语言学的光——语言没有阶级性,方才保证了这个科研“大跃进”的项目安全运行。

汉语成语,是语言在发展中逐渐积累的历史文化语言,有许多条,像曲沃收集、总结的,实质就是浓缩的一段历史,一个历史场景、一个历史故事、一条精辟的哲理。这类成语,是唯一的、稳定的;是不可分羹、衍生其他义的。作为信息交流,成语是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使用的书面语和口头语,一个成语一旦输出,接受方就立即明白她的含义并产生互动。她是雅言。

对成语,我没深入研究,但我留心他人对成语的解释和与成语有关的故事。

锦心绣口的张爱玲在随笔《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说:

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辟的断句,两千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地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接地说话的。而仔细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替人家写篇幅就是佛头着粪,写篇幅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行的俚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运用。

成语者,现成语也。语言的工具性,在成语的运用上最显著:她像一块块拼图或零件,作者在写作时,只要取来拼凑就成。作为信息交流,像张爱玲举的例,撰序者可以是应酬,受序者则莞尔一笑,也感到受用。文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端赖成语这个宝库。诗人杨炼最早注意到这种现象。他指出:“成语的产生,源于一种无数重复了的经验。它在语言中沉积、凝固,成为成语。说出一个成语,人们就代入自己经历过的那种重复的经验,来体会你说的含义。这是成语的意义。用成语写作,意味着你所表达的经

与成语有关的故事

卫建民

记得我受到总理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在他同当时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会谈时,我任他的翻译。班夫人请教总理治国之道,周总理谦虚地说:“我们的经验只能供班夫人参考。我们不能越俎代庖。”当时我一下子语塞了,翻不出“越俎代庖”。周总理对我语气温和但意思却很严肃地说:“你是年轻老的女儿,行老古中外,知识渊博,你怎么没能继承?连越俎代庖都不懂吗?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太少了。”我当时脸红耳赤,周总理还叫我把他的批评翻译给班夫人听。后来冀朝铸同志告诉我周总理也嘱咐他要通读《资治通鉴》。

『文汇报』
微信公众账号